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 禹湘

美丽中国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第一卷收录的《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美丽中国,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生态根基,引领人类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着眼于“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把“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202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新污染物治理”,科学部署2026年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工作。

我们要学好用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第一卷,深刻认识美丽中国建设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引向深入,更好地以科学理论指导全面贯彻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实际行动,切实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生态基础。

美丽中国建设内蕴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强调:“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丰富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美丽中国建设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和生动实践。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道路被视为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几次工业革命浪潮带来了生产力的跃升,形成了以化石能源为基础、以消费主义为中心、大规模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这种发展范式实现了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也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如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和以“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污染灾难等。传统工业文明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其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西方哲学理念,将人类置于自然的对立面,认为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征服自然,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虽然当代西方社会也有对发展极限的探讨、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反思,并提出了庇古税等解决环境问题、纠正经济增长负外部性的理论与方法,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传统发展范式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

紧张关系。联合国发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细项中,仅35%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缓慢,18%甚至出现倒退。这充分说明,不转变传统发展范式,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现代化进程将难以维系。

中国14亿多人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远超现有发达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建立在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现代化的根本性反思和创造性发展之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高度,着眼于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美丽中国建设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努力做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完成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使之成为全体人民共享的民生福祉。这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现代化,不仅满足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一种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现代化新道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美丽中国建设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有力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中国建设拒绝竭泽而渔的短视,摒弃将生态赤字留给后代的做法,而是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担当,为子孙后代积累绿色财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生态根基。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人类现代化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不仅是发展范式的变化,更是文明观的革新。当传统发展范式在全球范围遭遇生态瓶颈,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从文明发展演进的底层逻辑,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人类如何走向未来的重大问题。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承载着为人类文明探索永续发展新道路的历史使命。

美丽中国建设是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强调:“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美丽中国建设是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既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与时俱进,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和传统文化,产生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这种高度契合性,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突破了西方哲学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困境,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美丽中国建设始终坚持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不走美欧污染环境、牺牲生态的老路,而是推动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降低污染排放总量,既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又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让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显著优势得到充分彰显。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破解发展与保护二元对立的难题。中国古人说:“草木植成,国之富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肯定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肯定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又将自然生态纳入国民财富体系,将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美丽中国建设不断探索和拓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破解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经济与生态难以统筹协调、发展与保护难以平衡协调、只能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困境,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经济与生态互融共生、互促共进的巨大优越性,为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中国贡献。

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指引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依靠系统方法,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八卦等概念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宇宙观,蕴含着深刻的系统思维。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维、辩证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两者同频共

振、相互成就中准确把握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方法,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有效指引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思维,把系统治理的科学方法全面贯彻于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改变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段、缺乏协同的传统治理方式,形成了既科学严谨又充满中国智慧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有效实现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类自然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巨大优越性,指引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朝着更加科学、更加高效、更加管用的方向发展。

美丽中国建设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是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生动中国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美丽中国建设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和路径,也是一场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正在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

夯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必须始终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有机统一的必由之路。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必须依靠坚强的政治领导、科学的顶层设计、有力的制度保障,依托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确保有效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深化改革,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臻完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基石更加稳固、更加牢靠。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美丽中国建设贯穿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中,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具有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意味着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增长实现历史性“脱钩”,生态环境治理从量变走向质变,“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画卷正在成为现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展望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重点领域实现深度脱碳,生态环境健康优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美丽中国全面建成。”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为解决人类发展与地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作出中国贡献。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到“十五五”时期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再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本世纪中叶美丽中国全面建成,美丽中国建设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通过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做到梯次推进。这既遵循生态环境治理的客观规律,又契合现代化进程不同阶段的现实国情,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有条不紊、持续推进。

让人民群众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获得可见可感的实惠。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正在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日益变成可见可感的日常生活图景,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向全体人民展现出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中国立体画卷。今天,人民群众真切看到:天更蓝,2024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至29.3微克/立方米,比2020年下降16.3%,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7.2%;水更清,2024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为90.4%,首次超过90%,较2012年提高28.8个百分点,3000多条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山更绿,荒山披绿装,矿山变公园,我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5%,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物种栖息环境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长江江豚频现身影,云南大象北上南归,大熊猫、藏羚羊、东北虎豹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稳步恢复……这些可见可感的变化,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美丽中国建设中得到真切切的实惠,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鲜明特色。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提供实践样本。美丽中国建设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具体行动,有力证明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我们坚持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突出贡献。比如,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全球贡献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新时代以来,以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深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开展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合作,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绿色发展能力、环境治理水平,共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挑战;等等。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成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生动中国实践,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成果和有益借鉴。

(原载1月21日《人民日报》)

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 程种榕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具备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就必须拥有自身的主体性。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当前,国际局势风云诡谲,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文化作为社会意识,不仅影响国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导向,也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已成为各国发展所重视的现实性考量。

所谓主体性,是指将人视为实践与认识的主体,强调人在与外界交往过程中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主体性突出人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自主性强调人作为独立完整的个体,与外界相区别;能动性强调人并非被动地接受和认识世界,而是积极主动、理性地认识并改造世界;创造性则表明人在交流交往中获得的正确认识能够激发创造性思维,并进一步将创新性认识付诸实践。文化主体性,顾名思义,是将这一视角聚焦于文化向度,意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应对外来文化流入时,能够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自主性,维系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中华文化延绵不绝、历久弥新,其文化主体性曾历经鼎盛,亦曾蒙尘。唐宋时期,中华文明以傲然之姿雄立于

世;晚清至近代,则因民族危机而蒙尘于尺。然而,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至今未曾断灭的文明,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清醒认知与反思。在民族危机、西方列强推行奴化教育之际,仍不断涌现出弃医从文、以笔作剑,或忧国忧民、挺身赴死的有识之士,捍卫民族文化尊严,守护五千年文明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为中国人民所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精髓,也是世界文化之瑰宝。唯有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方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葆青春;而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面对的重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好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以正确态度对待不同时代、不同性质文化之间的交流。

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即世界各国因国情及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都拥有属于本国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对内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外表征国家的制度与道路。同时,各国并非孤岛,必须参与国际交往,因而各国文化也在交融与碰撞中相互吸纳合理成分,最终构成世界文化。放眼当下,伴随经济政治全球化而来的是文化全球化,各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便捷,催生出生

多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但也不乏别有用用心之人借文化交汇之机,由浅至深地进行文化渗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达,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创造了以往社会形态的人难以想象的科学技术与文明成果,推动人类社会整体大踏步前进。然而,他们企图建立的始终是“西方取代东方”的国际秩序,奉行所谓“普世价值”,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力图将“欧洲中心论”即“西方中心论”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充满血腥与奴役。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化,在面对弱势文化时往往首先采取吞并策略,通过文化渗透和错误思潮输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导致其社会失序,从而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无形的“文化殖民地”,形成“文化殖民主义”。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既要坚守自身主体性,又不能闭关自守,而应广泛参与世界文化交流与文化全球化进程,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点至至关重要。

“第一个结合”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个结合”在继承和发展“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也是中华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其中,“第二个结合”尤为突出,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科学可行的范例。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性质上存在差异,但二者具有多方面的耦合与适配性。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了良性的文化交流互鉴。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正确看待本国文化,同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用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捍卫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要求我们既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抵制封建文化糟粕卷土重来,也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杜绝全盘西化或崇洋媚外,时刻保持对西方负面价值观渗入的警惕性,防患于未然。

坚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华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为如何处理“古今中西之争”这一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方面,对于古今文化,我们要坚持“扬弃”,做到“舍得扬、舍得弃”。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自古形成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当继承并发扬,同时与当今时代相结合,以保持其时代性

与创新性;而对于其中落后的封建礼教等文化糟粕,则应及时摒弃,使经过筛选与沉淀凝练而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精髓的、与时俱进的文明结晶。另一方面,针对中西文化之争,我们应始终秉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精神。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固然存在诸多值得批判之处,但也应承认包含不少优秀且先进的文明成果,值得我们正视并学习——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还是社会治理等诸多领域,西方文化都有可供东方国家借鉴参考之处。面对中西文化交汇,我们要提升辨别能力,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蚀与不良文化渗透,坚决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立自主性;同时也要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及交流互鉴的理念,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一切积极因素,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处理好古今中西文化之争,有利于我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既坚守牢固的文化主体性,又与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相互碰撞、共存共生,为推动我国文化繁荣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注入动力,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支撑。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